

烟台故事

“北大门”不是座门

李镇

在我的家乡莱山区解甲庄街道东解村,姓氏堂号依然传承延续。村里人茶余饭后时常把“追远堂”“延义堂”“五份堂”“甘苦堂”等堂号挂在嘴边。除了这些堂号,还有一个叫作“北大门”的宗族被百姓时常提起。

“北大门”系名门望族分支

东解村的“北大门”家族,是一河之隔的西解村李氏家族分支。

西解村李氏家族是清代登州府“望族”之一。清乾隆十年(1745)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、蓬莱人丛中芷在为《李氏族谱》做的序言中写道:“国朝来登郡多望族,如吾邑大宗伯沙、福邑大司农王、海阳少司马李、宁海大司马李之四族者,其先世皆有阴德,云初毓庆,源远流长,故伟人辈出偶傥不群……”

李氏家族“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(今牟平)”,明嘉靖年间由李松率领众人从宁海州西门里迁徙到西解村定居,至今薪火相传五百余年。

据西解村《李氏家谱》记载,李初妍是清代李氏家族通过科考入仕的第一人。顺治五年(1648)55岁的李初妍以贡生身份出任山东青城县训导。他膝下有3个儿子,13个孙子。大名鼎鼎的清雍正工部尚书李永绍就是李初妍的孙子之一。

李初妍的13个孙子成家立业时散居各地,有的选择定居本村坚守祖业,有的选择迁徙到附近的大山后、繁荣庄、李家疃、结子沟等村庄繁衍生息,有的选择跋山涉水到外省,甚至海外(韩国、日本等)开枝散叶,俗称“十三支”。东解村“北大门”的李氏族人就是西解村“十三支”中的一支。

“北大门”第一人是“十三支”中排行老三的李笃绍。

李笃绍拖家带口到东解村生活后,斥资在村北一处负阴抱阳、藏风聚水的高塘处建造了一座大宅院。这座大宅院高堂广厦、碧瓦朱檐,尽显奢华。其质量、制式和规模当时在村里首屈一指。特别是这座大院还有一个明显标志建筑门楼,门楼的建造风格沿袭了李氏家族一贯的“高大宽敞”规划,要体现出祖上尊荣和家庭富足,具体要达到“轿子直接进出,人骑马上自由行走”的标准。因而,建好后的李宅大门气势雄伟,彰显尊荣。人们走到这里,无不惊奇感叹。天长日久,这个家族就有了“北大门”的称谓,并延续至今。说到底,“北大门”是东解村李氏家族的绰号。

“北大门”李氏族人栉风沐雨,人丁兴旺,枝繁叶茂。后来,他们根据自己在村里居住方位的不同,又扩充为三支,分别是“东地”“北台”“西院”。

“北大门”走出的红顶商人

如今,人们提起清代工部尚书李永绍,自然会联想到现存于西解村的“尚书府”。其实,这座“尚书府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尚书府,而是李氏祠堂。继续追本溯源,这座祠堂的前身是李九龄旧居。

在绵延五百年的李氏家族传承史上,如果说李永绍是科举文化的代表,那么,李九龄就是经商文化的典范。李九龄是“北大门”走出的商业巨子。

李九龄(1777~1845)是李氏家族第十一代。他原本是“北大门”李铕的第三个儿子。因居西解村的自家兄弟李钧膝下无子,李铕将李九龄过继给李钧为子。李钧26岁因病早逝,妻子曲氏担负起家庭重任,上奉公婆,下育儿女。曲氏是牟平处士曲树文之女,大家闺秀。尽管家境窘迫,曲氏依然支持李九龄进私塾学习。李九龄天资聪颖,又刻苦努力,未及弱冠就考中廪生。后来,由于不忍母亲含辛茹苦,李九龄毅然放弃学业,只身一人到北京谋生。

到北京后,李九龄在一家杂货铺学徒,他以胶东人特有的质朴、肯干、勤快,机灵赢得了东家的信任。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,八面玲珑的李九龄在京城商圈小有名气。后来,一位皇亲慕名登门,提出与他合办“龙封”商号,对方出钱,李九龄出人,专门给皇宫提供粮食等物资供应。

有了贵人扶持,加上自己出色的经商头脑,“龙封”商号财源滚滚,日进斗金。李九龄由此在京城商界风光无限。

积累了巨额财富后,李九龄锦上添花,又捐得从四品官衔,被朝廷封为“昭议大夫、昭武都尉”,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“红顶商人”,达到人生和事业顶峰。

李九龄在高光时刻荣归故里,斥巨资置办田宅。他请人修建了一大片宅院。其布局之巧妙,用料之考究,做工之精细,在胶东建筑史上堪称经典。现存的“李氏宗祠”就是当年李九龄故居中接待客人的房子,豪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

母以子贵。李九龄捐得功名后,为了表彰其母曲氏“德重金玉,冷似冰霜”的品行,清道光十四年(1834),朝廷下旨为曲氏修造贞节牌坊。现位于解甲庄街道办事处政府大街的石制牌坊是1993年李氏族人按照老牌坊制式规格恢复重修的。

此外,在西解村民俗博物馆还收藏着一块“奉天浩命匾”。此匾也与李九龄有关,是道光年间御赐褒奖李九龄及其家人的。

打土匪巾帽不让须眉

在我的家乡,人们至今传颂着“北大门”妇女曲氏拿起枪杆子打土匪保家园的传奇故事。

据1985年《解甲庄镇志》记载:“1926年5月23日上午,李奎五带领30多个土匪从烟台先窜到沟头店、西解等村打家劫舍,后又到小镇柿子园附近,和东村自卫团发生枪战后溃败。”

年近八旬的李伯仁,是目前健在的“北大门”李氏家族中辈分最高的人,也是第七版《李氏家谱》编委会成员之一。他博闻强识,饱读诗书,人称“活字典”。他向笔者回忆起了家族往事。

李伯仁说,当年他们一大家子有60多口人。他的父亲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“定海针”,家中的大事小情都由他打理。5月23日那天午饭过后,父亲安排几个雇工在磨坊里干活,自己带领家中余下的青壮劳力到村东泊田,村里只剩下妇女和老人孩子留守。下午3点多钟,人们忽然听见西边方向传来几声枪响,接着就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,有人扯直嗓子喊:“土匪来啦!土匪来啦!赶快关上大门!”

那时候,“北大门”的李家住地外筑有高墙壁垒,并设有栅栏门方便通行,护佑安全。大门关闭后,易守难攻。

李伯仁回忆说,他的伯母曲氏听到匪情后,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针线活,顺手提起长枪跑出家门。她一边吩咐家人马上关闭所有大门,一边率领众人爬上院墙,观察敌情,伺机而动。

在兵荒马乱的岁月,为了看家护院,“北大门”族人购置了长枪,还请人指导制作了大量土手雷。平日里劳动之余,他们除了出操锻炼,还练习射击投弹。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曲氏也和男人们一起舞枪弄棒,练就了一副好身板、一手好枪法。

众人在院墙掩体处隐蔽瞭望,但见30多个持枪土匪手脚并用猛砸栅栏门。原来匪首李奎五早就派人打探到“北大门”家资殷实,他们准备趁着李家男人上山下泊劳动之机洗劫一番。

曲氏瞅准时机,推弹上膛,抬手一枪将为首的一名土匪击毙。枪响为号,众人一齐向土匪开火。与此同时,在东大泊劳动的男人们听到村里枪响,拿起铁锹大镰飞也似地返回村里。土匪见势不妙,扔下同伙尸体,落荒而逃。

溃败到小镇柿子园,气急败坏的土匪点了一把大火后扬长而去。

(感谢李氏族人伯仁、玉平提供相关资料)

虎口脱险

曲京溪

母亲在世时,常对我讲她当年被敌人抓去后,靠机智虎口脱险的故事。每次讲,她都声情并茂,颇有感染力。那情景,我至今记忆深刻。

1928年9月14日,母亲生于平度市涩埠村。村里的地形属于半丘陵,没多少平整的土地。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家里地少人多,5个孩子一年到头吃不上顿饱饭。母亲在家中的女孩儿中排行第二,从小无拘无束,上树、爬墙样样都行,人送外号“二大胆”“假小子”。由于家里根本养活不了5个孩子,无奈,在母亲12岁那年,姥爷姥姥一狠心,把她送给我奶奶当了童养媳。我爷爷很早就去世了,家里三间刮风透风、下雨漏雨的破草房,还有不足一亩沙窝地,怎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?

母亲实在忍受不了生活的煎熬,18岁那年,她勇敢地走出家门,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,担任我们村妇救会会长。

那时,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,动员青年参军参战,组织人员帮助军属种地,忙得整天不着家。别看母亲没上过学、不识字,但她记忆力好,心眼儿活泛,有胆识。当遇到难办的事一筹莫展时,母亲总会绞尽脑汁想出解决的办法。在这方面,那些男同志都口服心服。

1946年,国民党全面进攻胶东解放区,11月,占领了掖县(今莱州市)。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,驻扎在掖县凤凰山南部的留驾村,大肆破坏党组织,屠杀共产党员。在敌人的淫威下,村里出了叛徒,国民党将母亲抓了去。

在去敌人驻地的路上,母亲心想只要咬住牙,不承认是共产党员,敌人就拿她没办法。到了敌人的驻地后,母亲听那个军官的口音像是本地人,心里镇定了些。

敌人审问母亲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了。母亲就跟那个军官拉近乎:“老总,听口音你是本地人吧?”军官没有搭话。“你看俺是个农村妇女,不认识字,就有一身的力气,干活挣口饭吃。”

母亲见军官没有对她行凶,过了一会,又接着说:“眼瞅着天快黑了,俺家里婆婆有病,孩子还小(当时母亲还没有孩子),俺天黑要不回去,婆婆不放心,孩子没人看,咋办?”母亲边说,边假装抹起了眼泪。

太阳快要落山了。见母亲低眉顺眼的,军官就吩咐一个当兵的把母亲送出了“哨卡”。

就这样,母亲靠自己的沉着冷静和机智虎口脱险,安然无恙地回了家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才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。

母亲于2009年7月31日离世,享年82岁,党龄64年。